

胡愈之论世界语



长春出版社

內容同食

胡愈之论世界语

李文编

世界语文愈胡

编文李

吉林出版集团

文辞著 林 序 胡愈之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长 春 出 版 社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集团

内 容 简 介

胡愈之是杰出的世界语学者，是我国世界语的宣传家、组织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为我国世界语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收入胡愈之论世界语的十一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国世界语运动发展的历程、世界语的理论、学习世界语的意义及方法。

在胡愈之诞辰95年之际，我们把这本书献给全国广大世界语爱好者和研究人员。

胡 愈 之 论 世 界 语

李 文 编

责任编辑：许 仲 董辅文

封面设计：陈静斌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重庆路40号)

长春出版社发行
吉林省物资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1年8月第1版

印张：3.1875 插页：3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70 000

印数：1—2500 册

ISBN 7—80573—545—X/H·6

定价：2.50元

胡愈之与世界语

(代序)

李 文

胡愈之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革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学者，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抗战前他曾任《东方杂志》主编。建国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

1896年9月9日胡愈之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86年1月16日于北京病逝，享年90岁。他七十多年为我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闻名世界杰出的世界语学者，是世界语的宣传家、组织家、理论家和实践家。这里主要叙述他一生为世界语运动所作出的卓越功绩。

一 少年时代开始学习世界语

1912年，胡愈之那时16岁，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当时周豫才（鲁迅）先生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学监。蔡元培先生首任教育总长，下令全国师范学校将世界语（Esperanto）列为选修课。胡愈之对蔡元培、鲁迅先生非常敬崇。他认真阅读蔡元培先生有关世界语的文章和讲话。当时世界语已传入我国多年，原有中国世界语会改组成中华民国世界语会，在上海建立中央事务所，设立世界语函授班，还建立世界语学社。他开始看了有关世界语的书刊，作了认真研究。

1913年，胡愈之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衰落，父亲要他拜绍兴

名家薛朗轩先生为师。这位老师是蔡元培先生的同学，是闻名浙东的学者。胡愈之在这一年的国文学习中，语文水平有很大提高。同时，他自学英文，还参加上海世界语函授班学习。他对世界语越学越有兴趣，对世界语的感情越深。在这一学期里他就初步掌握了世界语的基础，而且对他的英文学习也大有补益。

1923年，他写了一篇《世界语学习法》，谈了自己学习世界语的体会：

第一，要明确学习世界语的目的。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人类的爱的心情”。他讲了三点：（1）增进世界知识；（2）当作研究他种学科的媒介；（3）当作学外国语的阶梯。他说：“这是经过几次实验证明的事实。”

第二，怎样使发音准确。他讲到学习世界语必须得到下列的结果：（1）发音准确；（2）能通信谈话；（3）能自由阅读书报；（4）能自由作文，而不违背世界语文体；（5）了解世界语主义及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学习一种语言，发音正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世界语发音较其他民族语言容易学。现在出版的世界语课本都有国际音标、汉语拼音。各地有世界语协会，世界语者都可以帮助较正发音。而且现在有录音磁带，学习条件比以前好得多。

第三，是讲怎样学习语法问题。学习世界语比较难的和重要的是语法。世界语的语法，按照柴门霍夫的规定只有16条，比各民族语言的语法要简明、易懂、逻辑性强。但是语句的结构、词类的分别、语尾前后缀的变化，必须用心学习、认真掌握的。

第四，是单字的熟记。学习一种语言熟记单词是必不可少的，而世界语只要熟记一二千个词根，普通会话、作文、阅读书报已很够用了。

第五，是国际文体。

第六，是世界语生活。

他说，世界语学者不可不对于世界语产生的历史和世界语运动的现况有充分的研究。对于世界语运动的理论方面，更应细心

研究。学者自身应该加入宣传运动。最后，他总结说：“学习世界语从书本上练习外，更必须从事于实际的练习，就是从事于世界语生活。”他还说：“国际语运动的成就，是人类文化向上发展的一大关键，所以虽牺牲全生命以从事于此种运动也是值得的。所以不学世界语便罢，如学世界语必须立志造成一个热心、勇敢的Esperantisto！”（世界语者）。胡愈之称“世界语”，有时也称“国际语”。

《世界语学习法》是胡愈之在少年时代亲身的学习体会。他的学习方法对当前世界语的学者和其他外语的学习者都很有现实的意义和学习的价值。

二 青年时代的世界语活动

1914年，胡愈之18岁，就告别了学生生活走向了社会。这年春天他到了上海，考上了商务印书馆，在该馆编译所当练习生，后被分配在理化部工作。他学了日文、英文、世界语，就试着为《东方杂志》翻译外文资料和一些小文章，参加编写一些小册子，还参加编写《动植物大辞典》的索引。

当时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他晚上参加英文夜校学英语，还继续上世界语函授班学习。他丰富的科学文化和语言知识，就是靠自学而得到的。这时，他最爱读的刊物是《新青年》。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新青年》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倡白话文，对封建旧礼教与文言文进行批判。胡愈之积极拥护和参加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我国一场大的文字改革运动。那时，沈雁冰（茅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他和沈雁冰都喜欢用白话文写文章，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去发表。

这个时期，胡愈之对世界语特别感兴趣。他最爱看《新青年》上关于世界语问题的争论文章。他对于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

霍夫的经历和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柴门霍夫一生为世界语的伟大事业，为人类的和平和友谊的崇高理想十分钦佩。柴门霍夫是波兰的一位眼科医生，犹太人。1859年出生于波兰东部的一个小城市比亚里斯托克。那时帝俄占领了波兰，比亚里斯托克是一个多民族杂住的地方，犹太人占80%；另外有日尔曼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虽然不多，却是一个统治民族；犹太人恰恰相反，是最被压迫和歧视的民族。在帝俄的挑拨分化政策之下，彼此互相仇视，经常发生殴斗。柴门霍夫认为：民族间的仇恨主要是互相之间语言不通，感情不能交流。如果各民族间有一种共通的语言，互相直接了解，那么，这种互相仇恨也会消减的。1878年，柴门霍夫在中学八年级时，他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克服了种种困难，初步完成了这个语言的方案。

当时柴门霍夫才是个19岁的中学生，他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社会上所遇到的是轻视和非难。而柴门霍夫仍坚持国际语的探索。他试验他的语言，拿它来创作、翻译世界名著，实践使他的语言更精炼，使它成为一种简洁、合理、富有表现力、优美、和谐而流畅的语言。终于在1887年得到他的岳父的帮助，同时以三种文字公布了这个新方案。他用 Esperanto（希望者）笔名发表了《第一书》（Llnea Libro）。同时，他宣布了放弃对这个语言的任何个人权利，人人都可以翻译或使用这个语言。柴门霍夫立志为人类创造共同语言，而作为创始人不作为创造者，宣布放弃他个人的著作权。这种高尚的品质，对胡愈之的一生，不求私利，一心为公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

胡愈之不仅对世界语的产生作了深刻的了解，而且对世界语运动发展的历史也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在20年代初写了一篇《Esperanto以外的国际语方案》，开头就说：“国际语不是一时间所产生的，国际语的理想也不是到了近代才发生的。在几千年前就有人感觉到人类共同语言的必要。在几百年前就有人着手公用语文的创造，但因为那时国际语创立的时机还未成熟。所以虽有了许

多理想，不久也便消灭，虽有了几种方案，也不能成为事实。直到了19世纪的末期，柴门霍夫创造Esperanto，于是才收获国际语的理想的结果。”他具体分析了其他国际语方案失败的原因。他说：“世界语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学得从前许多失败的经验的原因。”

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87~1900），柴门霍夫在《第一书》里，希望有一千万人签名愿学世界语的志愿书。但是有一批人不等志愿书收齐，就立刻学习而且应用了，形成最初的世界语运动的队伍，其中有俄国人、波兰人、瑞典人和德国人。在这最初的队伍里，都是一些不讲实利、为理想而不惜牺牲的人，大多是生活很穷困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特别是在知识一方面，在国际关系、科学和文化的进步这一方面。这一时期中，世界语是在被考察、被试验的时期。

1891年，沙俄占领的海参崴已有世界语学社出现，出版一种用12国文字注释的世界语课本。一些懂世界语的俄国商人便把世界语带到哈尔滨，在那里首先传播开来。后来又有一位俄国人到上海开办世界语讲习班，陆式楷等参加学习，以后陆式楷就在上海开办了世界语夜校，这样世界语就从上海传播到各地。1908年，刘师培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世界语讲习所。

第二个时期（1901~1914），是从法国世界语宣传会的成立和《世界语者》、《国际语》、《评论》等世界语杂志的出版才开始的。法国的名人、科学家和有利的团体被吸引到世界语运动里来，法国成为世界语运动新的中心，世界语很广泛地传播，影响到整个欧洲。1905年开始举行每年度的世界语大会。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是在法国北部多佛尔海峡的布伦举行的。在大会上从世界各地来的各不同民族的人民，说着同一种语言，整个大会充满着其他国际会议所没有的气氛，证明着世界语确实是有实用功能的活的语言。世界语传到日本和美国，不久也传到中国。1908

年留法学生华南圭在巴黎出版《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汉文周刊，这两个刊物都竭力宣传世界语。另一位留法学生许伦博回到广州以后，在当地办起世界语讲习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世界语者的足迹，已经普遍到30多个国家。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语被应用到实际生活里了，人们为了实际的目的来用世界语。如邮票和画片的收集家、搞速记的人用世界语，和平主义者用世界语作宣传，商业上应用世界语。世界语书刊的出版，使世界语得到传播、交流和进化，得到更大的活力和丰富发展的效果。此时，国际世界语协会也成立了。在1908年开始，各地只有206个代表，1223个会员。三年后发展到885个代表，7804个会员，证明了世界语者之间的实际关系的发展，使得世界语在文体和修辞上完全成熟起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期间，胡愈之在1915年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一篇《世界语与世界和平》，揭露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发动的罪恶战争，主张世界要为人类和平而斗争。还发表了《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世界语之新势力》等文章。

由于残酷的战争，对于热爱和平和人类受的严重威胁，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过于忧伤，不幸于1917年4月14日与世长辞了。世界语遭受着战争的挫折和考验。在大战中，国际世界语协会（UEA）在中立国瑞士始终致力于和平的事业，为敌对双方国家中被分割的家庭转递家信20余万封信，是经过它在日内瓦的事务所转寄的。而且世界语在双方俘虏营里也继续在发展，显示出世界语的实际功用和生命力。

第三个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运动又活跃起来。在传播的技术上来用直接教授法。在思想方面，所谓“内在理想”的中立主义，已不能和现实尖锐的社会斗争相调和了。在1921年成立了全世界无民族性协会，到1929年发展到7000多会员（当时国际世界语协会的会员有9000多人）。这个主张阶级斗争的世界语运动，完全丢弃了所谓不同政治宗教的“中立性”。这个把世

界语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思想，给予世界语运动新的内容。在中国，绿星旗帜（世界语的标志）开始发出灿烂的光芒。

胡愈之在1917年1月《东方杂志》上，以胡学愚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世界语发达之现势》中说：“语言之不统一，往往引起种族之恶感，阻碍意志之沟通，其为害不可胜计。方今之世，文明大进，人类思想已有渐趋统一之势，而间以代表思想之语言文字，却不能一致，不可谓非进化之障。故世界语之发生，尤之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之勃兴于近世，此非出于偶然者也。”他在这篇文章中叙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1）世界语的发展史；（2）世界语的优点；（3）世界语的普及运动；（4）世界语之出版事业；（5）世界语与社会事业；（6）战后之世界语。

1919年，胡愈之参加创立上海世界语学会，开办讲习班、函授班。他自编世界语教材，亲自讲课。1921年10月，俄国世界语者、盲诗人爱罗先珂被日本政府驱逐来到上海，胡愈之接待了他，并在《国民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了《介绍盲诗人爱罗先珂》，并为他开了一个国际音乐会，有俄罗斯、日本、朝鲜、中国的音乐家参加，为扩大世界语的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胡愈之还将爱罗先珂的散文《为跌下而造的塔》、《春日小品》从世界语译成汉语发表，介绍给中国读者。他还和鲁迅合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出版。不久，胡愈之介绍爱罗先珂去北京与鲁迅认识，住在鲁迅家里。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大学将世界语列入正式课程，请爱罗先珂讲授，听讲的有500~600人。第二年在北大召开世界语联合会，到会的有2000人。上海也有7所学校开了世界语班。

1922年，胡愈之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国际语的理想与实现》。他阐明了：（1）世界语的目的和理想；（2）国际语问题的解决；（3）世界语与世界语主义；（4）国际语运动。他以简洁的语言表述了至今基本上还切合现时的观点。他指出：“国际语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一种工具”，“是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的

一种新发明的机器。”他那时就宣称：“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因为国际语是中立的，所以不干涉人民内部的事情；因为是辅助的，所以更不至侵害国语或民族语。”他对世界语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在1923年，他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文库》编了《国际与运动》、《新兴国》，是从世界语的书刊中翻译成中文的。这年上海世界语学会还开办了我国第一个世界语图书馆。

在这时期，胡愈之对文学也很有兴趣。他参加郑振铎、沈雁冰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经常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以及其他文学刊物上投稿。从世界语书刊中有他翻译的俄、德、法、西班牙、荷兰、丹麦、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土耳其等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弱小民族的小说。这些在当时文艺界很有影响，在青年读者中很受欢迎。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胡愈之与上海世界语学会同人，联合其它世界语团体，拟写了《致全世界之抗议书》，分发国际联盟、各国世界语学会、团体和各国世界语杂志，揭露惨案真相，抗议英、日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同年，上海世界语学会积极展开宣传，推广世界语的活动，举办夜校、星期学校和函授学校，胡愈之亲自担任教师。1926年，他与徐耘阡合编《世界语函授课本》正式出版。在1927年他撰写了《世界语四十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同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写的《世界语与文学》。

“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胡愈之目睹工人群众横遭枪杀，极为愤慨，第二天他亲笔写了抗议书，与文学家郑振铎等七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那时白色恐怖严重，他被迫流亡到法国。那时他还不不懂法语，通过与法国通信的世界语团体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解决了生活和学习问题，进了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法国参加世界语运动的大多是觉悟的工人群众，其中有法国共产党员。他经常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学习活动，接触了法国觉悟的工人群众，使

他更深入地了解到法国社会的面貌和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情况。经过他亲身的实践，证明了世界语是国际交往的有力工具，他成为世界语运动积极的宣传者。在1928年和1929年暑假里，他还作为中国世界语学者参加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和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语学会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他在法国认识了著名小说家、世界语者巴金，并经常往来。那时巴金翻译的小说，胡愈之给他介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他们在法国成为好友。胡愈之在法国三年，经过世界语者的帮助，到欧洲好几个国家旅游考察。

1930年，由于法郎开始升值，在法国靠从国内汇寄稿费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胡愈之不得不离开法国，经陆路回国。沿途要经过波兰、德国和苏联。他不懂德语和俄语，是通过各地世界语协会接待，游览了德国西部三个城市。他想经过苏联时在莫斯科能多留几天，了解一些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情况，但是在巴黎的苏联使馆只允许他在莫斯科停留一天。他只好求助于苏联的世界语学会。他从国际工人世界语团体的年鉴中，找到几个莫斯科世界语者的地址，写信告诉他们到莫斯科的日期，希望到时能得到他们的帮助。那是1931年1月下旬，苏联正是严寒的冬天，火车到达莫斯科车站时，就看到两位苏联女青年拿着小的绿星旗，她们是特地到车站迎接他的。莫斯科世界语学会的同志们非常热情，当他们知道胡愈之要多留几天参观访问，而没有得到签证时，他们立即积极去奔走，才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在莫斯科停留七天。他们给他安排食宿和参观日程，帮助联系参观访问的单位，而且陪同他一起到工厂、国营农场、商店、学校和幼儿园参观访问，并参加了工人和青年的一些集会，接触了工人、农民、学生、作家、教授等各方面的人士，使他在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收集了许多生动的宝贵资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刻体会到世界语同志之间的感情亲如一家，在绿星旗帜下，到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热情的接待和帮助。

胡愈之回国以后，仍在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的责任编辑

辑。他写了《莫斯科印象记》，报道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对苏联情况严加封锁，禁止报刊登载有关苏联的报道。正好有位樊仲云先生，过去也在“商务”任职认识的，他开办了一家新生命书店，还出版了一个刊物《社会与教育》，樊与国民党有关系，他出的刊物，书籍没有销路，他为了要吸引读者，同意在刊物上发表《莫斯科印象记》。读者为了要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相，都争相购买，果然销路大增。连载完后，樊还同意出版单行本。一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发现，急忙下禁令时，已经再版了五次。而且香港、南洋等地也多次翻印，受到港澳同胞、华侨的欢迎。当时广大进步青年走向革命，受《莫斯科印象记》的影响很大。而且由于《莫斯科印象记》的出版，各地青年掀起了学习世界语的热潮。

世界语运动第三个阶段的特点，是世界语和社会革命运动更紧密的结合。因此，世界语成为法西斯反动分子的眼中钉。德国希特勒和中国蒋介石都禁止世界语，许多世界语者牺牲了生命。但是更多的世界语者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第二次大战后，世界语马上又更大的发展起来。

三 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

“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这个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斗争的口号，是在1933年9月10月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二次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在这以前的两年间，中国世界语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这要从1931年1月胡愈之从巴黎经过柏林、莫斯科回国说起。他回国途中经过柏林时，访问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Internacio de proleta Esperantistaro 简称IPE）的机关刊物《国际主义者》（Internaciisfo）的编辑部。又通过世界语者的帮助在莫斯科作一周的访问。他回国后，在世界语运动方面主要做两件事：一

是出版了《莫斯科印象记》，上文已经谈到，这本书的出版对当时全国进步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有许多人读了这本书后开始学习世界语，掀起了学习世界语的热潮。二是他回国后，积极联系青年世界语同志，介绍“无产阶级世界语国际”的情况，共同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我国的世界语运动。正在这时，青年作家楼适夷从日本回国，他1930年与叶籁士在旅日期间与日本的革命世界语活动有过接触，曾同在东京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暑期大学世界语高级班学习。楼适夷回国后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主编左联办的《文艺新闻》刊物。胡愈之和他是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简称“语联”）的积极倡议人。开始参加“语联”的人有叶籁士、张企程、乐嘉煊、陈世德、肖聪等。稍后又有胡绳、霍应人、何增禧等几位以及其他一些青年同志。“语联”成立的报道刊载于1931年12月14日《文艺新闻》上，内容如下：

国内青年世界语者多人，外受国际新兴世界语运动的影响，内感文化工作上的迫切要求，觉得世界语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也只有适应这个新的时期，世界语运动才有它本身存在的意义。因此，发起了一个ĈPEU（中文名称用“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于本月三日在北四川路新雅茶室举行第一次发会式，到会者有胡愈之、张明理、乐嘉煊、陈世德、覃净于、适夷等十余人。由胡愈之、适夷等相继发言，阐明世界语的新任务与意义，在会场一致的决议下，规定纲领四条，并产生五人组成的临时执委会；推定胡愈之担任书记，适夷组织，张明理传播，包叔元国际通信，陈世德研究等部。决定目前工作为创设语学班，及设立国际通信部，发行杂志。最后确定适夷起草宣言及章程，在下届会议提出。

（按：这里提到的张明理即张企程，包叔元即叶籁士）

ĈPEU的世界语全称是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在《文艺新闻》上刊

载中文名称用“中国青年世界语联盟”，仅是在公开报道时用了一次，以后没有再用。

语联在上海，是我们党领导文化界的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领导的一个团体。在“文总”的领导下有“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等左翼文化团体。“语联”也是参加“文总”的组织之一。“语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世界语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胡愈之是这个新的左翼世界语运动的先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蒋介石对于日本侵略我国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主编《生活》周刊的邹韬奋，看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很受感动，他立即在《生活》周刊上热诚地介绍给读者。并且亲自去商务印书馆拜访胡愈之，约他为《生活》周刊写稿。胡愈之以“伏生”、“景观”等笔名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邹韬奋对胡愈之极为尊重，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内外形势，研究政治理论问题。胡愈之帮助邹韬奋使《生活》周刊与社会的现实斗争密切联系，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刊物，《生活》周刊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邹韬奋在实际斗争中成为一名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胡愈之与邹韬奋在共同战斗中建立起亲密的友情，他帮助邹韬奋建立起生活书店，这个书店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化出版事业中曾产生很大影响。

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及胡愈之住所均被炮火轰炸烧光。商务印书馆停业，《东方杂志》停刊。正在此时法国在上海建立哈瓦斯新闻通讯分社，聘请胡愈之担任编辑。同年夏秋之间，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发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邀请他和邹韬奋参加执委工作。不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回馆复刊《东方杂志》担任主编。

因此他工作特别忙，社会活动也特多。

但是，胡愈之对世界语运动是很关心的。正如叶籁士在《回忆语联》中说：“语联那时做实际工作的有张企程、乐嘉煊、肖聪，连我在内四个人。胡愈之忙于别的工作，并不直接参加语联的工作。每隔一段时间，由企程同他约好在一个什么地方碰头——最常去的是靠近外滩的一家外国人开的邓脱摩饭店。那里下午顾客很少，环境清静，便于谈话。我们向他汇报语联的工作，以及国际世界语运动的动态。他向我们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并对我们作些指导与鼓励。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邓脱摩饭店，胡愈之把鲁迅给世界语刊物《世界》（La Mondo）的一笔捐款转交给我们，这个刊物从创刊号起，我们每期都给鲁迅赠送一份，有一次经费发生困难，在刊物上呼吁读者捐助。鲁迅一定也见到了，主动托胡愈之送来了捐款。这不但是经济上的帮助，更主要的是对我们精神上的支持，给了我们这些青年极大的鼓励。”（《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二期）

那时国民党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对外进行新闻封锁。在白区他勾结帝国主义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进步文化事业和团体进行文化“围剿”，同时由于我们党内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在白区的党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左翼文化同盟各个群众团体只能在地下活动。1932年7月发生了肖聪被捕事件。一天晚上他去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春地画会教世界语，突然遭到法国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搜查，肖聪和艾青13名美术界青年被捕了。肖聪随身带一份语联的刊物，刊头上有镰刀斧头的记号，这就成为他的“罪证”。

由于肖聪的被捕给语联的打击和教训很大，胡愈之和语联的几位同志总结了教训，决定今后改变工作方式，在取得文总的赞同后，争取将一部分可以公开的工作与不能公开的工作区别开来。第一步从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到公共租界同孚路大中里，旁边有个小学校，晚上可以借来开办世界语讲习班，星期六可以举行

茶话会。后来又在卡德路租了一幢楼房作为会所，公开挂起了协会的牌子。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新国报》上刊登招生广告。两个月一期，读完初级班可以升入中级班。第二步，为扩大宣传举行一次世界语展览会，将所能搜集到的各国出版的世界语书刊，以及有关世界语邮票、纪念品等等，以中国世界语函授学校的名义，于1932年12月17、18日在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饭店二楼公开展出，在报纸上发了消息，登了欢迎参观的大字广告。为配合这次展览，世界语刊物《世界》创刊号赶印出来，在展览会上与读者见面。同时，还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书店销售国内外世界语书刊，收订中外世界语刊物，展览会获得意外的成功。

1933年1月22日，上海世界语协会正式成立了。函授学社、世界语书店、世界语讲习班等都归上海世协领导。另外还成立了世界语图书馆和巡回教授团，向一些大学派世界语教师。1933年9月10日，协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在会上一致通过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作为指导今后工作的纲领。从这时起，直至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口号一直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指导方针。

胡愈之在1933年初，经张志让介绍认识了张庆孚，经中共中央批准后，终于达到了长期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在党的领导下在文化界、新闻出版界、政法界和国民党上层元老之间都有交往，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工作。他对世界语运动的工作一直很重视。法国著名进步作家巴比塞受国际反战大会的委托，准备来中国，在上海与宋庆龄一起召开有各国代表参加的反战大会。巴比塞是世界语的积极支持者，胡愈之写了《巴比塞与世界》，在《世界》四月号上发表。他在文章中提出：“真正的世界语者，却不能抛弃了现实世界，除了文字以外处处要想到怎样用世界语去帮助世界改造，并且亲自参加这改造的工作。”

胡愈之对PEK（即普罗世界语通讯）国际通讯工作极为重视。工作的目的是运用世界语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新